

翻译符号学研究 (主持人: 王铭玉、贾洪伟)

主持人按语: 从时间上看, 翻译研究与符号学(尤其是社会符号学) 联姻甚早。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美国学者奈达率先利用社会符号学方法和视角探讨翻译问题; 1989 年起, 我国学界开始从普通符号学角度探讨文学和文化的翻译问题; 90 年代芬兰学者格雷(Dinda L. Gorlée) 首次借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 的三元符号学观探讨翻译问题。格雷于 1990 年提出“翻译符号学(semio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术语, 后改称“符号学翻译研究”。此后, 她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探究如何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歌剧及经典文本的翻译, 讨论皮尔士符号学三元观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异曲同工之处。几乎与此同时, 爱沙尼亚学者彼得·特洛普(Peeter Torop) 发表一系列论文, 尝试界定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边界, 澄清翻译符号学的内在构成、本质与属性、内涵与外延, 预测学科前景, 但他未曾上升到构建学科框架的高度, 留下了很多亟待探究的问题和尚可挖掘的空间。例如, 如何从翻译符号学角度重新划分符号类别, 如何从符号行为和符指过程角度描述翻译符号域, 如何从哲学角度构建翻译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何从信息传递角度考察符号转换过程中的信息守恒等。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更好地为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构建、理论建构和微观应用服务。在此背景下, 本专栏共收录 3 篇论文, 旨在以开放的视角探讨翻译符号学问题。《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守恒》一文借物理学之能量守恒定律、以类比的方式探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信息守恒问题。文章指出, 符号转换即广义的翻译, “翻译等值”寻求的即是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及意义的守恒。符号守恒以符号共相、信息守恒定律及文本信息恒量为基础, 其层次体现为由质感层到现实层再到思维层的连续统, 是一个动态叠加的过程。《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分类与转换》从翻译符号学视角, 尤其是人类符号活动与符号转换过程中的特殊符指过程角度, 将人类表意符号分为依存于外部世界物质介质的有形符号和依存于内部生理介质(即大脑内部介质)的无形符号, 探讨有形符号相互转换、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此三类过程涉及的符号范畴、层次、类别和系统问题。《间性研究的符号学近路》以主体性哲学概念为切入点, 思考符号转换过程涉及的间性问题, 从传统翻译研究对作者、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关注, 转向翻译符号学对符号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问题的考察, 探讨符号、文本、文化三者之间相互制约与促进的关系。专栏的 3 篇文章分别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符号分类与转换、信息守恒及由符号及制约符号活动的文化引发的间性等问题。虽然侧重点各异, 但都将翻译看作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就此看来, 翻译符号学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这一新兴领域中尚有一系列值得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

佟颖¹, 王铭玉²

(1.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2.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 该学科的出现是符号学与翻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 符号守恒指符号承载的信息总量在符号转换前后保持不变; 符号共相、信息守恒定律和文本信息恒量确保了符号守恒的实现; 符号守恒的层级体现为从质感层守恒到现实层守恒再到思维层守恒的连续统, 是动态叠加的过程。

[关键词] 翻译符号学; 符号守恒; 守恒层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8)01-0100-11

On Semiotic Information Con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TONG Ying¹, WANG Mingyu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semiotics is an emerging branch of Semiotics. It is a must for building this discipline to combine Semiotics with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semiotic information conservation refers to remaining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nslation. Semiotic universals,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nstant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are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semiotic equations." Hierarchy of semiotic conservation is a continuum, embodied from the texture layer to effective layer, and then, to thinking layer.

Key words: translation semiotics; semiotic information conservation; hierarchy of conservation

1.0 引言

信息无时无刻不在, 人通过获得、识别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事物, 从

收稿日期: 2017-10-02

基金项目: 本文为“辽宁省外宣翻译形象构建过程中的主体间性研究”(项目编号: WQN201713) 和“基于翻译过程的外宣翻译研究: 辽宁外宣翻译形象构建”(项目编号: L17BYY01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佟颖,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电子邮箱: tytllgt@163.com。

王铭玉,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符号学、语言教学、翻译符号学等。电子邮箱: mywang2@163.com。

而认识和改造世界。信息传播的媒介是符号,传播的方式是符号转换,即广义的翻译。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符号守恒是指符号承载的意义或信息守恒”(王铭玉,2015:23),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调的就是符号守恒或信息守恒。

纵观翻译学史,“翻译等值”一直是翻译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曾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但总体来看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两种:接受和否定。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将翻译中的“等值”绝对化了,将其比作数学中的“相等”,我们认为这有失偏颇。“翻译等值”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翻译衡量标准。“翻译等值”之于翻译研究,如同“绝对零度(-273°C)”之于自然科学,虽无法达到,但具有逻辑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等值涉及的因素(如形式、语用、交际、风格等)越来越多,各因素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从广义来讲,文本所包含的语言、文化、风格及其他所有成分都属于“符号”范畴,文本就是符号集合体,因此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等值应属于符号学范畴”(廖七一等 2001:352)。

2.0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联姻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结构、符号系统、符号意义、符号功能和符号用法的学科,内含所有类型的符号和语码,“是编码和解码最根本的一门学科”^①(Nida,1993:164)。翻译是跨时空和跨文化的符号转换活动,涉及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是对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可见,符号学和翻译之间具有相通性,对符号研究和翻译研究内共有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很有必要。佛经翻译伊始,翻译活动便与符号产生了联系,但两个学科真正的联姻则始于近代。

符号学思想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但直到20世纪,符号学的概念才由索绪尔和皮尔士正式提出,并经由叶尔姆斯列夫、巴特、莫里斯、雅各布森等人的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符号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结合,符号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相继出现,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索绪尔(2007:101)从心理学角度将符号定义为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双面心理实体,突破了语言是事物命名集和工具论的传统理解。受索绪尔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诞生,翻译研究走向客观和科学。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划分逐渐发展成为形式与内容,为直译与意译之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直译关注形式,意译注重内容,译者只需根据两种语言的接近程度、文本的体裁类型和翻译目的等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不存在对错是非。索绪尔(2007:102)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同一所指可用不同的能指来指称。符号的线性特征要求从更大的言语单位分析词或句子,以便消除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

皮尔士认为符号由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构成(王铭玉 2004:117),格雷(Gorlée 2015)根据这种“三位一体”的模式提出三种翻译等值,即指称等值、意义等值和性质等值。她同时指出翻译是一个符号过程,为了给符号常新的生命,符号过程是而

且必须是永无止境的、目标确定的持续过程。莫里斯提出符号学三分野,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指出符号过程包括符号载体、解释者、解释项、所指物、指表(王铭玉,2004:130)。雅各布森(Jakobson,1959:233)基于符号的“三位一体”划分出三重译域(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并在莫里斯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发送者、语境、信息、接触、符码、接收者等六因素分析法(同上:157),这些概念进而发展为翻译中的原作者、语境、信息、信道、符码、原文读者(包括译者)和译文、语境、信息、信道、符码、译文读者等十二要素。巴斯耐特(Bassnett,1980:27)基于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观,认为翻译等值应体现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且三者之间存在等级差别:语义等值优先于句法等值,语用等值影响并调节着前二者。

文化符号学以洛特曼的“符号域”为核心概念,认为文化文本在可译和不可译之间变动,而文化也因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相互作用不断重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析符号学以解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其核心概念是“互文性”,认为原文和译文都像马赛克一样,由很多与其他文本相似的文本块粘合而成。因此,原作失去了权威性,译者和译文的创新性得到了肯定,使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得以超越原作者和原文。文化符号学和解析符号学共同催生了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使翻译研究走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例如尼兰詹娜(Niranjana)认为翻译是政治行为,可用于调整民族、人种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郭建中,2000:178-179)。

文学符号学认为文学文本中符号的自指性即诗性(赵毅衡,1990:106),这说的是文学文本中符号的真正意义产生于符号无限衍义和永无止境的诠释过程中。文学翻译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这种自指性,译者不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读者,使后者能够感知原作品的意义,接近原作者的意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礼德提出社会符号学,进而奈达(Nida,1982:13)提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能从符号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出发,考察翻译活动涉及的所有因素,关注文本中不同层面的意义和功能,并分析翻译中主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社会符号学是研究翻译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内学界对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关注度很高。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使翻译学跨出了对纯语言的研究,进入到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对比关系研究和更广阔的文化比较研究中。

笔者以“符号学”和“翻译等值”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搜到63条相关记录(搜索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其中有41条从符号学角度考察“翻译等值”(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2篇,期刊文章27篇)。从宏观角度做理论研究的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等值做总体探讨,包括语义等值、语用等值、等值的模糊性标准、等值限度、等值层次、三种意义(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等值等问题;二是研究某个符号学家的翻译等值模式。微观角度的理论研究则多以社会符号学理论分析具体翻译现象中的等值方式,包括术语、文学作品、中餐菜名、文学作品人物名、新闻编译、广告、习语、商标名、电影片名、外来词等领域的翻译对等。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等值”的研究还停留在运用符号学术语剖析文本构成和诠释翻译过程层面。大多数研究以符号学概念为基础,对翻译中的某一个

或某几个层面的等值现象做对接描述,而没能从翻译是符号转换这一本质出发,以符号学与翻译学的相通相融为切入点,从翻译符号学的学科视角探讨“翻译等值”机制,阐述等值的理论基础,分析等值的层级及其实现方式等问题。

3.0 翻译符号学

国外学界对翻译符号学的关注始于上世纪末。格雷于1990年提出翻译符号学的概念,特洛普(Peeter Torop)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述翻译符号学的前景、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和理论构建等前沿问题”(吕红周、单红,2016a:106)。国内把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始于2014年贾洪伟的学术会议论文《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参见《山东外语教学》2016年第3期),随后他陆续围绕这一概念发表多篇论文(贾红伟,2016a,2016b,2016c,2017a,2017b),其学科呼吁得到王铭玉(2015,2016)、吕红周(2015,2016a,2016b,2017)、单红(2016a,2016b)、潘琳琳(2016)、寇福明(2017)等诸多学者的回应。

翻译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翻译学和符号学,容易与同样涉及这两门学科的其他交叉学科混淆,如符号学翻译研究和符号翻译学等。华劭(2005:1-2)认为,不同学科可共享某一对象物,但必须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如医学和社会学都把人作为对象物,但其研究对象分别是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王铭玉(2015:扉页)认为,符号学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的附属研究范畴,旨在“以符号学理论阐释翻译现象、验证翻译理论的‘脚注式’研究,还未上升到‘学’的阶段”;符号翻译学“以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符号问题为切入点,借用符号学理论方法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构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理论及方法论”;而“翻译符号学旨在通过符号学研究方法,探讨符号转换的本质、规律、规则、任意性与阐释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建构以符号转换问题为对象的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

可见,翻译符号学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宗旨在于超越以往运用符号学理论阐释翻译问题及现象的层面,从学科融合的角度审视翻译行为,构建自治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包括翻译过程中的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符号守恒等。

4.0 符号守恒之翻译符号学分析

符号转换的目的就是信息的对等传递。符号解释的无限性使完全对等成为不可能,而其未来性又为对等传递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能够实现提供契机。因此,符号守恒只是相对的,并非数学意义上的“恒等”。

4.1 守恒的基础

4.1.1 符号共相

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媒介。如果把人类

的一切交流形式界定为广义的翻译,那么符号就是翻译的唯一媒介。洛特曼将符号分为第一模式化系统符号和第二模式化系统符号,前者是自然语言符号,后者是在自然语言符号基础上建构的文化符号,即人工语言符号。传统的翻译活动以自然语言符号间的转换为主,而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活动不仅包括自然语言等有形符号间的转换,还包括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间的相互转换。风俗习惯、道德法令、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文化符号都属于翻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

首先,“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概念结构”(王寅, 2002: 2)。语言作为思维工具,存在于人与世界之间。“语言形式……在许多方面还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同上)。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具有象似性,不同语言符号间的语义具有共相性,且任何语言都能够表达概念、解释现象、抒发感情。因此,语言符号可相互转换,第一模式化系统中的信息可传递。

其次,受客观物理世界中异质性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结构存在差异,这反映到文化中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民族文化符号存在和活动的空间是符号域。“边界把不同的民族文化符号域分割成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本民族的符号域为内部空间,其他民族的符号域为外部空间”(郑文东, 2006: 42)。边界区分事物的同时,也联系事物。它将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联系起来,具有双重文化性,是两种文化符号域的中介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栖息着两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文化共核,它使翻译跨越语言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实现符号转换。因此,信息在第二模式化系统中可传递。

信息传递律表明,任何系统的信息均可表征到别的系统中去,形成信息的传递和流动。符号共相为符号转换提供可能性,符号转换伴随着信息的传递与转化,“转化”并不等同于“守恒”,但二者密切相关。只有找到各符号系统相互转换中对应的当量关系,信息量守恒才能被确立。

4.1.2 信息守恒定律

“现代物理学认为……任何封闭系统都是从宏观上讲的,从微观上看都是开放的”(孙志鸿, 1987: 52)。所谓的增熵现象,只是针对封闭系统而言,信息在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系统外的能量和信息的作用所引起的”(同上)。谭箭(1993: 72)认为,信息作为物质的属性之一,与物质的质和能具有转换关系,从质能守恒定律可推知信息守恒定律。客观物质系统都承载着一定量的信息。物质系统间产生相互作用时,信息可以传递或转移,但此过程中客观信息的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信息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所谓信息的产生过程不过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之间原有信息差异度的减少过程,同时也可能伴有部分潜在信息的显化,但这都只是信息形式的转变。相互作用是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得以传递和转移从而得以“保存”的条件。物质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由一个物质系统传递给另一个物质系统,其中的信息并不会消失。

从人文系统角度看,物质世界的信息可划分为显化信息和未显化信息,前者是被人类掌握的客观信息,可理解为人类的认知和知识,后者是尚未被人类掌握的那部分客观信

息。与此类似,丰成君(1989)认为在人们的实际交流中也存在两种信息,即显态信息和隐态信息。系统表征具有连续性和延展性,“隐态信息经过显态信息表现,经传递到达下一个系统,形成下一个系统的隐态信息,然后又经记忆转换而形成显态信息。如此循环,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和自然的信息网络联系”(同上:5)。而“无论什么系统,其信息无论被表征多少次,其信息量始终保持恒定不变”(蒋永福、李集,1998:19)。

翻译作为符号系统间相互作用和转换的活动,伴随着信息的传递与表征变化。翻译过程中信息会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和呈现方式的转变,但信息总量应该是守恒的。

4.1.3 文本信息恒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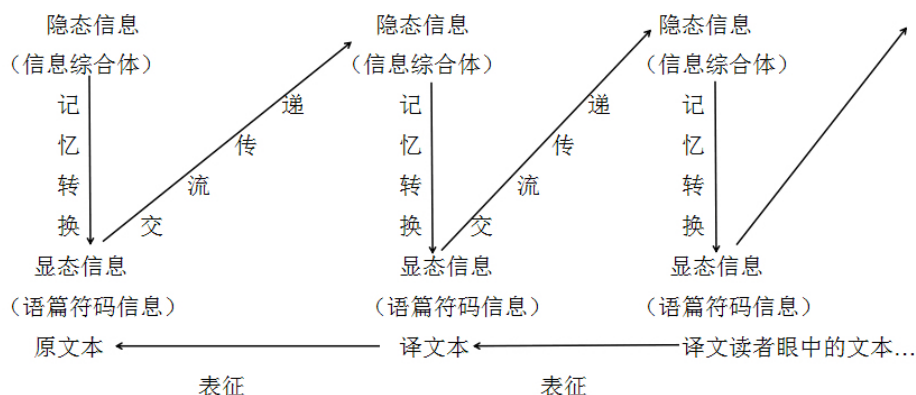
人类的信息是观念的输入和输出物,其载体为符号(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信息的传递就是符号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用符号来解释符号的过程。皮尔士符号学中的“解释项”具有自我阐释能力,阐释过程是开放的和无限的(王铭玉,2004:125)。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不是固定的逻辑关系,而是动态的衍生过程。每一个符号的形成都是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每一个符号的存在和发生作用都与其他符号相关联。翻译作为符号阐释过程,不断生产符号解释项,使符号在新的语篇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裹挟时代、社会和政治伦理等因素,不断衍生出新意。或许正是因此,翻译等值、信息守恒和符号守恒才看似不可能。我们认为,文本信息同样由显态信息和隐态信息构成,前者是语篇符码信息,是固定的;后者是信息接收者头脑中的信息综合体,包括语义信息、语用信息和社会附加信息,具有抽象性、变化性、社会性和个人主观性。

“无论是自然信息,还是生物信息与人类信息,都有取值与取义。取值的过程就是价值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取义的过程”(黄小寒,2005:89)。在物质的相互作用中,信息的取值具有特定性。如果信息是物质系统的特征参量,在信源与信宿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信宿对特定的信息取值不变,是有规律的;如果信源与信宿是非直接联系的,信息本身这一特征参量虽未缺失,但由于受传递过程中“噪音”的影响,信宿对信源的取值将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产生多种可能性。而由于信源本身不变,信息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同上:88)。

翻译符号学认为,所有的符号转换都是广义的翻译,包括有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也包括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翻译过程就是信息表征的过程。原作者将记忆中的隐态信息转换成显态的原文本语篇符码信息;原文本的显态信息通过交流传递到达译者这一信宿,成为译者头脑中的隐态信息,即一种混沌的信息综合体;当译者对这一信息综合体加以记忆转化,并运用译语将其呈现为显态信息时,就要对其进行衡量取值。由于二者是直接联系的,译者对原文本特定的信息取值不变。即便由于译者受外部环境及自身特定条件的制约,阐释过程中发生区别性符号关系或行为,也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由语码^②调节)。而原文本本身未变,其信息量自然不会有太大差异。

译文表征原文本的过程中,原文本显态信息的呈现形式会发生变化;隐态信息多数会直接转换为译文本的隐态信息,部分会转换为显态信息,如某些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等;社会附加信息则大多会为新的社会附加信息所取代。译文在被表征的过程中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文本无论被表征多少次,文本所含有的信息只是在度量上发生变化,

信息总量会基本保持不变。表征过程如下图所示:



4.2 守恒的层级

皮尔士提出三个“普遍范畴”,即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所谓一级存在,指的是自我独立的存在,皮尔士又称之为‘感觉状态’。……二级存在是个别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经验,它牵涉到主体与被感知事物的关系。……三级存在属于……抽象的范畴,它使具体的时、空经验获得新的形态。……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之间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丁尔苏 2000: 51-52)。译者作为“社会人”对原文本进行阐释时,“须经历一级符号的直觉情绪域(图像),通过二级符号的现实世界域(图表),最终走向三级符号的思维域(隐喻)”(格雷 2015: 106)。“由一级符号到二级符号再到三级符号的转换是符号生长过程中意义指称不断进化的结果,也是符号转换的机制所在”(王铭玉 2016: 5)。

一级符号是译者对原文本的形式和结构等外在特征的初步感知,包括整体布局、图案、颜色、字体、字号、标点、行距等,属准解码阶段;二级符号是译者对原文内容的解码阶段,译者寻找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性,构建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三级符号是译者通过思维将原文本信息的形式、意义和功能整合后,将已匹配的信息外化为全新的符号文本,属编码阶段。本文以此为基础,探讨符号狭义范畴内翻译过程中的符号守恒,即两种不同语言符号文本之间的转换过程中质感层、现实层和思维层的符号守恒。

4.2.1 质感层守恒

如果符号与对象是基于相似度的一元关系,这一符号就是像似符或一级范畴符号。译者无需对此类符号的解释项做任何推理,只需关注文本的物理特征,凭借感官直接进行符号转换。这一层次的符号转换不以传递原文本的深层信息为目的,而是以象似性为基础,传递一种直观感受,实现符号转换过程中的“质感守恒”。这类翻译中涉及较多的是“异型诗”和“意识流”类文学作品。所谓“异型诗”是一种文字排列结构非常独特的诗,这种诗的文字排列方式与诗意相关,能够体现诗歌的主题,因此译者要“复制”这种结构,以使译文本与原文本具有象似性,实现一级符号的直觉情绪对等。至于“意识流”类文学作品,在质感层面,我们重点关注标点符号的使用及词序情况。请看下例:

middle	aged	中	年
couple	playing	夫	妇
ten	<u>nis</u>	打	网
when	the	球	打
game	ends	完	后
and	they	回	家
go	home	那	球
the	net	网	仍
will	still	隔	在
be	be	他	们
tween	them	中	间

(黄杲圻译, R. McGough, 40-love)

直观上看,这首诗的排布像两个人在打网球。在不关注内容的情况下,译诗依据象似关系,模仿原诗的布局、符号排列方式和音节数,做到了质感层的守恒。

4.2.2 现实层守恒

如果符号及其所指对象系基于动态或因果基础的二元关系,这一符号就是指示符或二级范畴符号。指示符号涉及一个图像符号在某个特定场合下的具体意义,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空间等因素相关。符号狭义范畴内的语际翻译过程就是透过原文本符号的能指探寻符号所指、再将该符号所指表征为译文本能指的过程,亦即在译语符号域内(用译语表征)原文本的现实意义、实现符号转换“现实守恒”的过程。文本作为符号集合体,是由符号在横向上依据组合关系和在纵向上依据聚合关系编织而成的信息网络。每一种符号关系都具有意义,都表征信息。现实层面的信息守恒应关注横向的语词层面、纵向的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语词层面涉及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等符号关系的对等;语义层面以语言的指称意义^③为基础,传递符号与动态对象的关系;语用层面从表征层、表达层、联想层、使动层和寒暄层等五方面对指称意义加确,使其完全符合文本的时间、空间要求,准确体现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语用层面的信息守恒要通过语词层面和语义层面信息的守恒来实现,且三者大多数情况下是融合、而不是分裂的关系。请看下例:

原文: Genie! SagteSettembrin: In - tu - i - tion! Sagteer. Und dannhechelteer die übrigenHeilanstanalten des Platzesdurch und lobte auf beiende Art den ErwerbssinnihrerInhaber.

译文1: “天才!”塞塔姆布里尼说。“真是异想天开!”他说。于是他挑剔这一带高地上其它的疗养院来;……(钱鸿嘉,1991)

译文2 “天才啊!”塞特姆布里尼叫道。“头-脑-灵-敏!”他说。随后,他对达沃斯地区的疗养院逐一加以讽刺;……(杨武能,2006)

从词语层面,译文1和2都做到了词汇和句法等符号关系的对等;在语义层面两译文

也都准确地传递了指称意义,实现了符号与动态对象的对应关系;但从语用层面来看,译文 2 明显优于译文 1。仿照原文中的“*In-tu-i-tion*”,译文 2 的译者在选取的汉字词语中间同样加上破折号,这样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就会延长发音,从而切身感受到原文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那种讽刺口吻、体会到说话者的身份和特点。

4.2.3 思维层守恒

如果符号与对象是基于协约或习惯的三元关系,这一符号就是象征符或三级范畴符号,是唯一真正的符号。三级范畴符号与其表征对象没有象似关系,也不直接关联,可自由表征对象,表征方式因符号使用者而各异。思维层的翻译,从狭义的角度可理解为语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符号系统内出现的符号转换活动。现实层的翻译涉及具体指示意义,为某一文本内的特定意义;思维层的翻译涉及除具体指示意义之外的所有指示意义之和,具有抽象性。

语内翻译是对已产生的译文的再解读,对已获得的指示意义的再开发,使其符合不同场合的要求,尽可能挖掘原文本符号在象征层面的意义,关涉语境信息。语境信息是一个三面复合体,涉及语场、语旨和语式等。笔者认为(2016: 122 - 124),原文本的语场包括叙述的社会行为和构成文本内容的社会行为。前者是作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创作活动,译者在“创作”译文的过程中实现;后者指的是文本内各个角色进行的社会行为,译者通过传递原文中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等来实现。原文本的语旨包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角色内部的关系,前者通过译者自身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来传递,后者通过译者介绍文本内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件来实现。在实际翻译中,第二层语旨等值较易实现,第一层语旨等值受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读者差异等因素影响很难实现,只能通过甄别词义、调整句序,借助情态词等方式实现。而语式的对等只要保持文体一致就可实现。现以一条常见的汉语标语的翻译为例:

原文: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译文: Go to work happily and come back safely.

从语际翻译角度看,译文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信息,基本实现了“现实层”的符号守恒。但我们很清楚,操英语的本族人看到这条标语会一头雾水,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原因就在于符号使用者不同,符号表征方式有差异。从语场角度看,如果该标语用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场合可直接译为“*Safely first in work!*”,而在普通的工作场合就可以译为“*Be enthusiastic in work and enjoy yourself after work!*”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粗略地将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图示如下:

实现方法	凭感官直接转换	寻求各层面指示意义	挖掘象征意义,达到译者目的
守恒层级	质感层	现实层	思维层
翻译过程	准解码阶段	解码阶段	编码阶段
符号关系	像似关系	指示关系	象征关系
对应范畴	一级存在	二级存在	三级存在

从左至右,是一种逐级递进和被包含的关系,左边是右边的基础,也是其组成部分。从下至上,是符号学与翻译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符号守恒的理论解释。

5.0 结语

翻译是伴随着信息运动的符号转换过程,翻译符号学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来看,该学科能合理切入翻译问题,在拓展符号学研究范围的同时,推动翻译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我们从符号共相、信息守恒定律和文本信息恒量等角度探讨了符号守恒问题,关注信息的广泛联系性和转化性,而不将某一层次或某种形式信息的改变看作信息的增减,因为信息会以其他形式得到补偿,其总量是不变的。符号守恒是一个从质感层到现实层再到思维层的连续统,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过程。质感层翻译是一级存在,是守恒的基础;现实层翻译是二级存在,包含质感层翻译;思维层翻译是三级存在,以前二者为基础并包含前二者。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守恒不是一对一的静态比照,而是一对多的动态叠加过程。

注释:

- ① 笔者译,原文为“No hol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can exclude semiotics as a fundamental discipline in encoding and decoding signs”。
- ②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语码是一种符号组织原则,控制文化的语义风格,决定说话人选取意义和听话人解释意义。它通过人际交流来约定,通过个人的记忆来传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原语文化语码、译语文化语码、情景语码等各种语码的调控。
- ③ 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传递的本质信息,是符号与动态对象之间的关系。区别于字面意义,常被称为“概念意义”或“认知意义”。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Methuen, 1980.
- [2] Gori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M]. Amsterdam: Rodopi, 1994.
- [3]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In Achilles Fanget al. (eds.). *On Translation* [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2 – 239.
- [4] Mann, T. 魔山 [M]. 钱鸿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 [5] Mann, T. 魔山 [M]. 杨武能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 [6] Nida, E. *Translating Meaning* [M]. California: San Dimas, 1982.
- [7] Nida, 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8] 丁尔苏. 语言的符号性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9]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0] 丰成君. 论信息交流(一) [J]. 情报科学, 1989 (3): 1 – 10.
- [11] 格雷. 元创作 [J]. 贾洪伟译. 语言符号学通讯, 2015 (1): 89 – 124.

- [12]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华劭. 语言经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4] 黄小寒. 从不同领域信息学的比较研究再论信息的本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 (12): 87 - 90.
- [15]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 2016a (1): 94 - 97.
- [16] 贾洪伟.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b (3): 90 - 100.
- [17] 贾洪伟.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c (5): 11 - 18.
- [18] 贾洪伟. 间隙弥合——古希腊经典翻译之符号学解读[J]. 外文研究 2017a (1): 70 - 75.
- [19] 贾洪伟. 有关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翻译符号学思考[J]. 中国文化研究 2017b (3): 154 - 160.
- [20] 蒋永福, 李集. 信息运动十大规律[J]. 情报资料工作 1998 (5): 18 - 21.
- [21] 寇福明, 吕红周. 从符号学看翻译[J]. 外语教学 2017 (2): 91 - 94.
- [22]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3] 吕红周. 从翻译符号学看中央文献术语俄译的策略[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5): 14 - 22.
- [24] 吕红周, 单红. 从翻译的重新定位谈翻译符号学[J]. 外语学刊 2016a (5): 103 - 107.
- [25] 吕红周, 单红. 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16b (5): 33 - 39.
- [26]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26 - 32.
- [27] 孙志鸿. 信息的本质和信息守恒问题[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4): 48 - 53.
- [28] 谭箭. 对信息量守恒定律的探讨[J]. 咸宁师专学报 1993 (4): 71 - 72.
- [29] 佟颖. 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 [30]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31]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刍议[J]. 中国外语 2015 (3): 扉页 22 - 23.
- [32]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1 - 10.
- [33] 王寅. 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 1 - 6.
- [34] 赵毅衡. 文学符号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
- [35] 郑文东. 符号域的空间结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 (1): 39 - 42.

(责任编辑: 张羽佳)